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半砖园斋 论红学索隐派

郭豫适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丛书主编 傅璇琮 黄霖 罗剑波

半砖园斋
论红学索隐派

郭豫适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郭豫适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5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2059-2

I. 半… II. 郭…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2575号

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

郭豫适 著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25 字数 246千

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2059-2/I·971

定价: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古代的文学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从远古朴实的民谣、奇幻的神话，到《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唐宋古文、元曲、明清小说……花团锦簇，美不胜收。它以无数天才的作家、优美的作品、多变的文体、鲜活的形象、生动的故事、独特的风格与鲜明的民族特点，充分地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人生理想、聪明才智、崇高精神，以及审美情趣与艺术才能。它们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珍贵的结晶，也是全世界文学之林中耀眼的瑰宝。

有文学，就有欣赏，就有批评，就有研究。早在先秦时代，对文学的批评就随处可见，如《左传》中写到季札在鲁国观乐，对《诗》中的众多作品一一作了点评。后来逐步产生了一批理论批评与研究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等，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树立了典范。到 20 世纪初，在中西融合、古今通变的潮流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与书写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截至 1949 年，已陆续产生了一批现代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新中国建立以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近七十

年来,特别是从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尽管有时也不免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与曲折,但总体而言,不论是文献的整理或考辨,还是理论的概括与分析;不论是纵向或横向的宏观综论,还是对作家或作品的具体探索;不论是沿用传统的方法作研究,还是借用了外来的新论来阐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人才之多、论著之富与质量之高都是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

这批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名家的代表性论著,本身也有学习与传承、总结与研究的重要价值。为此,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倡议与支持下,我们陆续邀请了一批当代在世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实绩、有影响的名家,由他们自选其有代表性的专论结成一集,每集字数在 30 万字左右。第一辑选有十位学者,年龄不等,照顾到各自研究对象的不同方面。以后将还陆续推出,计划本文库的总量在 50 本左右。

我们相信,本文库的每一集文字都曾经为学术史的推进铺下过坚实的一砖一石,都曾经如一股强劲的东风吹开过读者的心扉,拨动过大家的心弦。如今重温他们精到的论断、深邃的思考、严密的逻辑、优美的文字,乃至其治学的风范、人格的魅力,都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学习与承传的典范,也为总结与研究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辉煌历史铺路开道。我们这样重视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希望能推动学界进一步深入地去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搞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并积极地去发掘与阐发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从中汲取优秀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美学情趣,使之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实现中国梦起到积极的作用。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正当我们这套丛书的第一辑即将付梓问世之时,傅璇琮先生于 2016 年 1 月 23 日突然病逝。在这套丛书的筹划与出版的全过程中,曾得到了病中的傅先生的悉心指导与全力帮助。他的逝世,是学界的重大损失,也直接影响了这套丛书的后续工作。我们将沿着既定的思路,编辑与出版好这套丛书,以作为对傅先生永远的纪念。

前 言

钟明奇

郭豫适先生《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一书2006年9月曾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现作为傅璇琮先生、黄霖先生、罗剑波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文库”（第一辑）之一种，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再版。本书分为上辑“历史篇”、下辑“评论篇”、附辑“访谈篇”三辑。收入在本书中的诸文章有的是从郭先生已经出版的专著中摘录出来的，如上辑“历史篇”就摘自其所著《红楼研究小史稿》《红楼研究小史续稿》，而其他论文与访谈也都发表过，均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反响。郭先生之所以不辞辛苦，从他多年以来出版的许多著述中，梳理、摘编相关内容编成此书，旨在于对前些年红学研究领域里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新索隐派予以科学的剖析和深入的批判，体现了老一辈红学家强烈的学术责任感。郭先生在本书《后记：从红学索隐派说到“秦学”研究及其他》中说：“出版这本书主要目的是想说明，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是错误的、非科学的。读者们不要相信这些出诸主观猜测的不切实际的东西，研究家也不要再在索隐派之路上继续追求出新，再去搞这种猜谜式的

研究了。”

客观地说，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新索隐派，其研究方法，与从前的索隐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郭先生在本书上辑“历史篇”之“索隐派的兴盛与前代表作”中指出：“从《红楼梦》研究史上看，评点派、索隐派都好用谐音法来解释《红楼梦》里的字义，结果自然就只能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如在张新之看来，‘扇’就是‘善’，所以晴雯撕扇，‘撕扇’二字就被附会为‘思善’。但在蔡元培看来，‘扇’就是‘史’，所以石呆子的‘二十把旧扇子’就被附会成‘二十史’。其实晴雯撕扇，跟‘思善’有什么关系？石呆子二十把旧扇子，跟‘二十史’又有什么相干？这些所谓‘关合’或关系，都是这两位红学家强加于曹雪芹、强加于《红楼梦》的，并不是实际上存在的什么‘隐义’。”

上述这种情形在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新索隐派那里完全存在。当然，刘先生本人并不承认他是索隐派，他说自己是“探佚学中的考证派”。但他的“秦学”研究，用的其实就是上举索隐派谐音法之类的研究方法。举个典型的例子来说，他有一篇题为《“友士”药方藏深意》的文章（见《红楼望月》，书海出版社，2005年）。刘先生在该文中说，《红楼梦》第十回中，那个太医张友士之“友士”谐音“有事”，是京里派来的“政治间谍”，其所配的那张药方并不是一般的药方，“实际上是一道让秦可卿自尽的命令”。何以见得呢？这是因为药方里开的是这样五种药：“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刘先生硬把“云苓”隔开，“云”作“说”解，“苓”作“命令”解，这样他就把药方说成是：上面命令秦可卿在熟地自尽。刘先生在文中写道：

那十个字可分为两句读：“人参白术云：苓熟地归身。”也就是告诉秦可卿为家族本身及贾府利益计，令她就在从小所熟悉的地方——具体来说就是“天香楼”中“归身”即自尽。……“人参白术”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倘“白术”理解作“半数”的谐音，则正合十四，而康熙的十四个儿子争位的恶斗一直延续到四子雍正登基之后。

事实上,这里“白术”作为一种中药,“术”当读 zhú,是不能读作“数”的;将“白术”谐音成“半数”,这种转换即使从谐音法的运用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而他硬说这人参的“参”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这“半数”“正合十四”,而十四是隐指康熙的第十四子。这样的“研究”,岂不是太牵强附会、太武断了吗?因此,郭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他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全是索隐派的老一套。”(见本书《后记》)这就是说,刘心武先生的这种研究,与上引前期索隐派张新之、蔡元培用谐音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直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罢了。因此,读者如果熟悉《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就不会对刘心武先生的此类研究感到新奇,自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学术研究,什么是红学发展史上早已被人批评、否定过的“索隐派的老一套”,进而能以比较科学的、健康的心态去欣赏《红楼梦》,由此真正领略到我们民族历史上无以上之的文学瑰宝——《红楼梦》的伟大与精彩。

如果说,本书上辑主要从“史”的角度让广大读者认识到,索隐派红学其实早已存在,且名声不佳,那么,本书下辑的十篇论文,则是从“论”的角度,亦即从学理上让广大读者认识到索隐派红学的非科学性,揭示了索隐派红学终归穷途的必然性,同时也批评了红学研究中其他的不良现象,如红学研究中的“逆反心理”“炒作”与“曹雪芹再生”等等。郭先生在《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一文中指出:“为什么在红学研究中索隐派著述不绝如缕,有时还显得相当热闹,而我们却说索隐派红学在学术上终归穷途呢?这并不取决于批评者对它所持的批评态度,而是由索隐派研究方法本身客观存在的并且是无法克服的非科学性质和非科学倾向所决定的。”事实正是如此。索隐派红学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红楼梦》的小说特质,而是把《红楼梦》当成生活的“真”的“实录”。正如郭先生在本书上辑“索隐派的兴盛与前期代表作”中阐述“索隐派的观点与方法及其影响”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能理解文艺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根本不懂得文学批评的科学的方法”,只是“把文学作品零碎、简单地还原为生活的事实”。这实际上就是把《红楼梦》当

成一部史书，而不是文学作品。因此，他们是在解读所谓的历史，而不是在分析由具象的生活经过作家典型化之后形成的文学作品。他们的那种研究方法，其实就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早就批评过的“读小说者，也以考证之眼读之”。学术研究的大前提已经错了，怎么能保证其研究结论的正确呢？其次，他们“根本不懂得文学批评的意义和作用”，“把《红楼梦》当作一个‘雅谜’，然后又各自挖空心思地去猜这个‘雅谜’”。那么，这些“雅谜”是怎样出来的呢？郭先生在本辑《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他——关于红学研究中的非科学性问题》一文中说：“猜谜人自己即是制谜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如刘心武先生解读那张药方，实际上就是在猜“雅谜”，而这个“雅谜”其实就是刘先生自己制造出来的。因此，他认为王蒙先生“没有读懂”《红楼梦》第十回下半回《张太医论病细穷源》，唯有他才能“读懂”。把《红楼梦》当作“雅谜”来猜，这的确满足了不少读者与观众的好奇心态、“探秘”心理——新旧索隐派许多冠以“揭秘”、“大揭秘”或“解码”的著述，之所以盛行，个中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但这与严肃、认真、科学的学术研究来说毫不相干，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从根本上说，索隐派红学在学术上必定终归末路。

郭先生的《索隐派红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历史经验教训——评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一文为红学界高度重视。这是因为，该论文除了对近半个世纪海内外索隐派红学作了科学的评判之外，还对《红楼梦》研究的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作了科学的、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辨别，这是郭先生对《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红学研究界，很多事实上搞“索隐”的人，也说自己是搞“考证”的。如前面我们提到刘心武先生就不认为他是索隐派，说自己是“探佚学中的考证派”。一般读者对此不易分别，而郭先生的这篇论文却从四个方面，对此问题作了严格区分，并能使人读后一目了然。郭先生在该文中说：“首先，就提出论题而言，考证家的论题一般地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论题的提出以考证家对研究对象的初步观察和了解为基础，强调论题来自客观对象；索隐家的论题的提出往往是来自某种先入之见、某种既定的

主观悬念,在索隐派红学著述里,许多论题即所谓“谜”,其实都是这些猜谜家自己制造出来的”,“其次,就论证过程而言,考证家的论证强调遵循逻辑、尊重客观事实,在论证过程中,其思想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材料到理论;索隐家在这一点上恰好与考证家相反,他们在论证过程中,其思维方法的基本特征和走向是从结论到材料。在索隐派的著述中,论证的过程和方法往往是支离破碎、东拉西凑,他们的论证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有时是把事实和材料裁减、组合得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有时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再次,就结论验证而言,考证家在主客观条件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其考证的结论是比较切实可靠的;当然,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考证家有时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考证过程及其结论会有失误,但以考证方法所得的结论无论是对是错,一般地说是可以验证的;而索隐家们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总是评价甚高,往往自诩为曹雪芹的隔世知己,《红楼梦》的真正解人,其实他们的结论往往是主观猜想的产物”;“最后,就研究价值而言,科学考证的目的和作用是通过认真踏实的研究,去探讨一些实际存在的科学问题,在研究过程中遵循科学规律,依靠已知的科学知识,从已知到未知,帮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获得新的知识;索隐家们索隐的具体的目的和动机虽然有所不同,或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或为了证实某一政治成见、心理观念,或则借此自炫博学、善于解谜,甚或借此消磨时日,以驱遣文字自娱并以此娱人,总之他们最看重的是追求兴趣,满足自己和同好者心理的需要,但也正由于他们的研究具有主观猜测、随意附会的通病,往往就不能自圆其说”。《红楼梦》研究中有关科学考证与主观索隐区别的论述,恐怕没有比郭先生此文说得更严密、更科学、更完整的了,可以说是关于此一问题的带有经典性的阐述。而对这一问题如果在学理上未能有科学的认识,我们就难以正确地辨别各种形式的新索隐派红学,从而使《红楼梦》研究回到的正确的科学的轨道上来。这就是郭先生此文的重大学术价值之所在。

本书“下辑”中郭先生其他有关研究红学的论文也写得很精彩,其

中有的较为直接地研究索隐派红学的，如《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论争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隐派》一文，就是一篇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不但写得较早，而且同样以科学的分析，揭示了索隐派红学的必将终归消亡，是索隐派红学研究史上气势磅礴、不可多得的佳作。又如作为本书“代自序”的《拟曹雪芹“答客问”》也极具特色。这是一篇用小说笔法写成的学术论文，模拟曹雪芹的口吻，对《红楼梦》研究中的种种奇谈怪论，包括红学索隐派的种种谬说，给以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嘲讽。郭先生说，他之所以写这篇学术论文，就是觉得“现在‘红学’研究里面还有一点‘旧’气，正如有些同志所说，旧红学索隐派的观点和方法的影响还未清除的缘故”，具体地说就是“有的文章‘旧’气横秋，‘索隐派’‘自传说’的味道颇浓，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揭示《红楼梦》这部‘奇书’思想艺术之奥秘，而有些读者也误以为这是什么新发明、新创造”。这篇论文发表于1981年12月21日的《光明日报》《文学》专刊，距今三十多年了，但让人感到就是针对当今有关红学研究而写的，读来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附辑”是“访谈篇”，总共只有六篇文章，且篇幅不长，专门谈《红楼梦》研究的只有两篇。在这六篇访谈中，郭先生明确提出了一个看似老生常谈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风问题、文化遗产研究的思想与方法问题，但归结起来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学风问题。毫无疑问，学风问题有关学术研究的生死存亡。郭先生之所以判定各种形式的索隐派红学必然终归穷途，乃在于他们研究《红楼梦》其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主观随意性。研究《红楼梦》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其研究方法竟然主观随意，这当然是一种很坏的学风，怎能由此去正确理解《红楼梦》的伟大与精深呢？这注定了这种研究的没有出路。郭先生在本辑第一篇访谈《〈红楼梦〉研究要倡导严谨的学风》中说得好：“红学研究大有可为，例如《红楼梦》有些什么好的艺术经验，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有什么启发或借鉴的地方？这些专题就大可研究，我们有的同志为什么不走科学研究的阳关大道，却要

去走索隐派的独木小桥呢？”这与他在《从胡适、蔡元培的一场论争到索隐派的终归穷途——兼评〈红楼梦〉研究史上的后期索隐派》一文中早就指出的“我们研究《红楼梦》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放到《红楼梦》本身上来”完全是一个意思。研究《红楼梦》应当把注意力和着重点放到《红楼梦》本身上来，这不仅仅是郭先生一个人的意见，其实也是老一辈红学家与广大学者用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研究《红楼梦》所达成的共识。

要而言之，郭豫适先生的这本《半砖园斋论红学索隐派》，不但对红学研究史上各种形式索隐派作了有相当理论深度的科学的论析与批判，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明了《红楼梦》研究的正确方向，充分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学术担当。

需要说明的是，“访谈篇”中《博学深思 实事求是——郭豫适教授访谈录》一文，发表于《文艺研究》2009年第5期，为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拟曹雪芹“答客问”——论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一书所无，现收录本书中。

代自序：拟曹雪芹“答客问”

倘若曹雪芹活着的时候，曾经在“悼红轩”接待来访的客人，有些红学家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曹公！您大作里面那位林姑娘究竟写的是谁？”你想，曹雪芹会怎么回答呢？这倒是颇有意思的一个题目。可惜，在考证家的著作里我们没有读到回答这个问题的《曹雪芹访问记》或《和作家曹雪芹座谈纪要》之类的文字。那么，我们来虚构一番如何？我想是可以的。

话说某年月之某日，天气晴好，曹雪芹家里来了不少客人。当然先有一番“曹老，您好！”以及“久仰久仰”“幸会幸会”的话，这个不必细述。

客人们步入厅内，各各入座，献茶之后，有位红学家便首先发言。他说：

“雪芹先生，您的《红楼梦》不折不扣真是一部奇书哪！鄙人尤其佩服您在人物形象方面艺术构思之新奇。真没想到，您那个

林黛玉写的并不是一个女子，却是一个男人，对不对？我看，你写的是纳兰性德所奉十二位上客之一的朱彝尊吧！”^①

曹雪芹听了觉得很突兀，便问：“何以见得？”那位红学家哈哈地笑起来，显出很有心得的样子，说：

“彝尊姓朱，您就称黛玉为‘绛珠’。朱彝尊号竹垞，您就写林黛玉住潇湘馆。竹垞生于秀水，您就写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您老真是锦心绣口，笔底生花，艺术构思奇妙之至呵！”^②

这第一位红学家话音刚落，便有另一位红学家接着说：“仁兄读书探幽索隐，见解甚高。不过，据我看林黛玉并不是写的朱竹垞，其实是写的康熙皇帝的废太子胤初！不然怎的林黛玉的遭际心事跟废太子那样相似呢？曹老，您说是不是？”^③

先发言的那一位正想答辩，第三位便插上来说：

“二位差矣！《红楼梦》诚然是奇书，但女人终归是女人，雪芹艺术构思再怎么出奇，总不会颠倒阴阳，将男人写成女子吧。我有足够证据可以说明，林黛玉写的必是顺治皇帝的董鄂妃，而董鄂妃，诸位知道是谁？就是早先那个秦淮名妓董小宛！我索性告诉诸位吧，《红楼梦》里的贾宝玉——那个‘情僧’，其实就是因为伤悼董妃夭亡，便去五台山落发为僧的顺治皇帝。此事故老相传，古人岂欺我哉！诸位倘若不信传闻，好在雪芹先生在座，大家

① 陈康祺《郎潜纪闻》：“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

②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云：“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绛珠草长于灵河岸上。”

③ 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云：“黛玉之名，取黛玉下半之黑字，与玉字相合，而去其四点，明为代理两字。代理者，代理亲王之名词也（康熙废太子胤初封理亲王）。理亲王本皇次子，故以双木之林字影之。”又云：“全书描写黛玉处，直将胤初一生遭际及心事，曲曲传出。”

可以向他请教。”^①

曹雪芹听了这些评论，心里又好气又好笑。但还没有等到他答话，便又有一位插嘴说：“写林黛玉必是影射后妃，这一点可以肯定。只是她影射何人，还可商榷。我看林黛玉影射的并不一定是顺治皇帝的董鄂妃，而是影射乾隆皇帝的皇后富察氏。”^②他的话刚说完，便有第五位红学家大声地说：

“诸位，你们把《红楼梦》人物的思想艺术的意义未免都看得忒小了！雪芹先生写林黛玉哪里只是影射一个人？要知道他写林黛玉是用来代表‘亡明’的，就像他写薛宝钗是用来代表‘满清’的一样。否则，为什么把林黛玉写得那样瘦弱，风吹欲倒；而薛宝钗却是那样的丰满，简直是气吹欲化呢？”^③

这时座中窃窃私议，也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的。对他的发言，有的赞成，有的反对。赞成的佩服他读书心细，能发人之所未发，看问题又拎得比较高。反对的说他纯是猜测之词，而且对林瘦薛胖的解释，未免太过离奇、过于穿凿了。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时候，忽又有一位红学家（此君写有关于《红楼梦》的专著，但其实是谣言家）说：

“诸位诸位！且听我说。刚才诸公宏论，其实都是错的。据我研究，雪芹先生写林黛玉并不是写一个生活里的人，而是一本

①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又云，董鄂妃者，“实则人人知为秦淮名妓董小宛”。

② 邓狂言《红楼梦释真》第二回云：“曹氏之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原配嫡后，由正福晋进位，后谥孝贤皇后之富察氏也。”

③ 景梅九《石头记真谛》云：“黛玉代表亡明，故写得极瘦弱，风吹欲倒。宝钗代表满清，故写得极丰满，气吹欲化。”又云：“黛玉号潇湘妃子，写亡国哀痛，如亡君。宝钗号蘅芜君，指满人兴于荒芜水草地，而入主中国。”

书——《金瓶梅》——里一个女主人公的翻版。贾宝玉乃西门庆，林黛玉即潘金莲。所以关于林黛玉究竟是谁的问题，可说已经解决，你们诸位不必东寻西找。《红楼梦》里的人物，全都可以在《金瓶梅》里找到。林黛玉嘛，没问题，这位贾宝玉的恋人、林如海的姑娘，也就是西门庆的小老婆之一、潘裁缝的女儿。”^①

他这高论一出，合座哗然。对他这种荒唐而又低级的发言，很有几位面有愠色，正要开口批驳。这时，只见一位并非红学家的来客站起来说：“诸位！我们今天是来访问曹先生，并不是在这里开学术讨论会，各位如有高见，只说主要观点即可。时间不早，还是请曹先生多给我们讲讲吧！”于是，到会的人才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曹雪芹身上。

却说曹雪芹刚才在听那些红学家的提问和发言时，有时只是莞尔一笑，有时又皱起眉头，有时则脸色显得很严峻，心里很不痛快。他觉得刚才多数红学家的发言，虽然不着边际，胡乱猜测，但究竟还不是诽谤攻击，情有可原。惟独那个一派下流胡言的“红蠹”（不知雪芹对此等人如何称呼，姑妄名之），不但凭空污人清白，造谣诽谤贾宝玉、林黛玉，而且简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诬蔑。总而言之，曹雪芹对诸如此类没完没了的胡猜妄测，实在很不耐烦，不愿意再听下去了。这时便站起身来，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对大家说：

“我的作品承蒙诸位关注，很是感谢。不过刚才诸位的高论，恕我直言，实在跟《红楼梦》是不相干的，曹某不敢领教。我很抱歉，没有上过大学读过《文学概论》的课程，理论方面讲不出艺术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的关系究竟如何。但我是一个作家，很知

^① 闾铎《红楼梦抉微》认为“《红楼》全从《金瓶》化出”，认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即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又云：“林黛玉即潘金莲。鬻儿者，言其嘴贫也。一部《红楼》，林于文字为最长；一部《金瓶》，金莲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盖林从贾雨村读书，此外并无一人曾上过学；潘亦于七岁往任秀才家上过女学，为《金瓶》各人所无。”

道塑造一个文学典型，不通过艺术虚构而只是‘实录’一个真实的人物，那是不行的。我只能告诉诸位：《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并不是一个实有的人，是我创造的，我书里的林黛玉就是书里的林黛玉。……”

曹雪芹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拿起杯子呷了一口茶。同时心里在琢磨：“‘我书里的林黛玉就是书里的林黛玉’，光是这句话，这班红学家们能听懂、能接受吗？最好再引哪一位理论家的话来帮助解释一下，也许就更有说服力了。可是，引谁的呢？”

是呵，引谁的呢？高尔基和鲁迅倒是很合适的。高尔基说过，小说创作应当是“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取出他们“最特征”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鲁迅关于自己塑造人物典型，也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可惜的是，曹雪芹当年站在那里“答客问”的时候，高尔基和鲁迅他们二位尚未出世，高尔基的《我怎样学习写作》和鲁迅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还没有发表，所以里面有关的话曹雪芹无从引用。否则，他们二位都是作家而兼理论家，以他们的崇高威望和切身体会，引用他们的论述，毕竟比光是讲那句“我书里的林黛玉就是书里的林黛玉”的话要有说服力得多。

那么，高尔基、鲁迅之前，还有谁说过类似的话没有呢？其实是有的。曹雪芹毕竟记性是好的，他略一寻思之后，就高兴地说：“有了！”原来他想起了歌德，便转身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来对众人说：

“诸位，我现在把歌德的一段话介绍给大家，他的话可以说回答了刚才诸位所提出的问题。不过，我首先得声明，以歌德的伟大，我不敢跟他媲美；另外，他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绿蒂，跟我小说里面的林黛玉情形也不一样。我之所以要向诸位介绍歌德的话，是因为他告诉我们：文艺作品中